



春秋时期,中华大地上“大国八百,小国三千”,姑蔑,是古越西陲的一个小国。公元前222年,秦王政25年,在“姑蔑之墟”建立了太末县。今天的龙游就是在“姑蔑之墟,太末之里”的历史沿革中产生的,因而,龙游堪称全国最古老的县治之一,姑蔑文化就在这一方土地上滋生。

姑蔑文化与余姚河姆渡文化、余杭良渚文化同属古越文化光芒照射下产生的地域文化。而且接纳了徐氏族人南迁带来的先进的中原文化,并与之融合发展,使姑蔑文化更显灿烂辉煌。

姑蔑的范围包括现在的衢州市和相邻的金华市、丽水市一部分以及江西省的玉山地区。今天的龙游是姑蔑故宫的所在地,姑蔑宫,就是姑蔑子的王宫,据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姑蔑故城“在澁水(衢江)南三里,东门临薄里溪(灵山河)”,位置与龙游县城位置相符。所以,龙游是姑蔑古国的政治经济中心,也是姑蔑文化的发祥之地,富有丰厚的姑蔑文化底蕴。

灿烂的龙游姑蔑文化

◎ 赖谋新

文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活动的遗迹和古老文化的见证。龙游城东6公里寺底袁遗址发掘的陶豆足、夹砂陶罐、夹炭黑陶片、石刀、石铲、石镞、穿孔石器及玉珠、玉玦等,经考古学界从陶器质地、制作工艺及玉器、石器特征判断属新石器时代,与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“龙山文化”中的黑陶文化一样古老(约为公元前2800—前2300年),属父系族公社时期。另外,在商周与汉墓葬群中出土的各种玉器、陶器、青铜镜、铜器等一千多件文物中,不少属于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,如1991年县博物馆在东华山清理发掘的8座汉墓中出土的80余件随葬器物,青瓷器釉色滋润、光亮,胎质细腻,烧结程度高,装饰盛行鸟纹。同时出土的铜镜、五铢钱及铁人、剑亦铸造精致,花纹繁缛,有高浮雕东王父、西王母和羽人登仙及羽人乘龙等优美的神话故事,其文化蕴含不逊于精美的古越文化。

墓葬文物既反映了墓主的身份与社会地位,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,但更能直接证明当地生产水平的还属古窑址。1983年初,衢州市文物普查队在横路祝村发现的汉代窑址群,有白洋坳、鸡头坳、三石龙等十多条窑,分布在约1.5平方公里的一片岗峦起伏的黄土丘陵上,各窑的堆积层明显而丰厚,碎片散布面积约500—1500平方米,厚度一般在20—70厘米,各窑产品大致相同,以烧制陶器为主,也兼烧少量釉陶。器物的形态与纹饰,和宁波地区的郭塘窑、上虞大山顶上窑基本相似。同时,横路祝窑产品与龙游城郊汉墓群出土的大量陶器器位一致,证明当时龙游陶瓷工艺水平之高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我国乳油釉瓷最早由北方的钧窑创烧于北宋,而我县方坦窑却出土了唐代乳油釉瓷,我国陶瓷历史为此改写。

蕴含着极丰富文化内涵的龙游石窟是姑蔑文明的又一辉煌。龙游石窟,千古一绝。尽管谜团横生,众说纷纭,至今尚无定论,但它作为凤凰山下一个气势宏伟、构造奇特的人工开凿的地下建筑群已是无可非议的不争事实。千百年前,我们的先民以当时低下的生产水平手工开凿出如此宏伟(高二、三十米,最大面积1000多平方米,最小的310平方米)的几十个石窟,而且工艺水平之高,令人叹为观止。石窟群中心七个洞呈北斗星状,洞洞相邻不过数米,最短壁距仅半米,这在当今地下工程中,运用极为先进的地下探测仪器亦很难做到,石窟的四壁陡峭笔直,棱角分明,窟顶则无一例外地呈45度角,从约20平方米的洞口向下倾斜,而且洞顶与洞壁、石柱的接壤处凿痕呈弧形展开,凿痕均平如刀削,纹理匀称细密,凿痕整齐排列,极像是机械加工而成。洞洞有石柱,空间小的一、二根,空间大的四、五根分担顶部的荷载,布置均匀,而且与顶交接处做成喇叭状加大截面,完全符合力学原理,形成良好的构造关系。如此浩大精美的地下建筑,即使以当今生产力、工艺水平来操作也是特大难题。先人如何破解这些难题?难怪人们惊呼:千古之谜。

龙游,重教之风远古。生活于东西汉之际的龙丘苴曾受聘任议曹祭酒(教育官职),

南齐徐璠之与侄徐伯珍首立精舍(学校)讲授,在浙江教育史上都属领先地位。历经刘勰、杨炯、宗泽诸名人县令的创导,到宋朝县内学风大振,全宋一代中式进士109人,还有状元1人,盛况空前。吕防一家五子登科;状元刘章,父子进士;宰相余端礼,父子三人进士;夏蹈中、夏蹈南、夏蹈规兄弟三人进士,真是人才济济,盛极一时。

教育的振兴,带动了经济、文化的发达,形成宋、元、明间姑蔑文化的鼎盛期。人文荟萃,“儒风甲于一郡”(宋·毛开《超览堂记》)，“庶民饶喜商贾，士则缙学缀文取仕进”(明徐杰《县城记》)。学术研究之风亦在姑蔑之墟大兴。光《易经》研究就有徐伯珍《周易问答》、徐庸《周易意蕴凡例总论》、余端礼《周易启蒙》、余峽《易启业》等著作问世。《尚书》研究有刘愚《尚书解》一卷，夏偃《尚书详解》二十六卷。自然科学方面有数学、天文、光学兼通的民间科学家兼道学家赵友钦(号缘督)，所著《革象新书》，被明《永乐大典》和清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。其科学业绩名扬中外，当代著名学者，巴黎索邦大学名誉教授艾田蒲在《中国之欧洲》一书中赞叹赵友钦十三世纪就以等边多角形近似圆周的方式，精确到圆周率七位小数，实为远东伟大数学家的成果。为姑蔑文化重彩增色。

姑蔑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龙游商帮的兴起，他是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的衢商集团，以经营珠宝业、贩书业、纸张业著名，足迹遍及全国，秦晋滇蜀视若比邻，还不时出没在中印缅交界的边疆地区以及沿海港口，号称“无远而不届”。

他们具有儒商风范。经营珠宝与贩书商务，不是一般商人所能胜任，姑蔑文化孕育出来的龙游商人“亦儒亦贾”，他们从事的既是商业行为，也是文化传播，有的本身就是文化名人。如书商童佩，“藏书万卷”，著述甚丰，既是书商也是名儒，“一生淡泊处世，不求仕途，不攀龙附凤，以嗜书校书贩书为好。”(陈学文《龙游商帮》)龙游商帮以“诚信”著称，质量是商品的生命，龙游商帮是很注意商品质量的，书商童佩出书都亲自考证真伪，聘良工刻刊，每个环节都坚持高标准。百年名店滋福堂重金延聘名医坐堂，配药要精确不误，店员、药工分工细密，层层把关。“西山傅立宗”的屏纸产品，洁白薄韧，不少张，无破损，保持了商品的信誉，取得了绝好的名牌效应。胡筱渔先生经营的姜益大棉布店，坚持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薄利多销。聘有经验丰富验银工，凡经过该店验收的银元，盖上“姜益大”印记，顾客绝对放心。一次从海宁布庄订购七千五百匹石门布，价值六万银元，货到店，中途遭劫。海宁布庄派人来处理，主动提出赔偿。胡筱渔不要对方赔偿，还设宴款待，并再付六万银元货款，重购七千五百匹石门布。从此，两家结成良好的贸易关系，姜益大被商界视为金衢严三府第一家。

龙游商帮的巨商大贾致富不忘报效社会，“乐施行善”，如纸业富商林巨伦，捐资数千修桥，造凉亭，纸商傅元龙出资建凤梧书院，修通驹桥、鸡鸣塔，成为创建精神财富的社会贤达，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姑蔑文化的魅力。

商业既促进产品的交流与经济的发展，

也沟通了人们的思想文化，它的兴盛衰落也影响龙游人的生活形态、思想观念和民情风俗，从而对地方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。比如在龙游城乡至今还保存的一批精美独特的民居古建筑，就是当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，它们讲究结构，设计独特、新颖，建筑造型美观，巧妙地把建筑学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。不仅在浙西现存数百幢明、清古建筑中绝无仅有，而且在全省明代古建筑中也属罕见，受到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。

创造文化的首先是人，龙游早有英才问世，列乡贤榜首的龙丘苴，以“志行学问”知名于世，与当时名流严光友善，引为同道，《后汉书》、《太平御览》都有记载，入传《两浙名贤录》。唐工部侍郎徐安贞兼集贤院学士，南宋状元刘章、宰相余端礼，元末明初民间科学家赵友钦，名列浙江百位文化名人的近代学者余绍宋，著作《中国大革命史》、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兼学者的华岗等都是其中代表人物。

纵观龙游历史上的知识精英，其学问德行贯穿着淡泊名利的传统气质。学而优则“仕”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理念，而龙游知识分子有志之士却有不少不恋仕途，淡泊名利者。龙丘苴“笃志好学，以耕稼为业”。王莽当政时，几次请他出山，都不肯就任，隐居终老龙丘山。中唐进士出身的工部侍郎徐安贞，因不愿与奸相李林甫同流合污而弃官，被誉为“幽谷之太阳”。状元刘章，不肯依附秦桧，未老而力求告归，研究学问，封赐“文靖”。科学家赵友钦更是“隐遁自晦”，过着埋名隐姓的生活。直至近代的学者余绍宋一以贯之，因支持学生爱国行动，拒签“金佛郎案”，罢官以书画自娱。龙游知识分子的另一传统特征是“光明磊落、刚正不阿”。南渡名宰余端礼无私无畏，在宫廷争议中直言不讳，坚持正义。一次宫中讨论皇帝祭天禘谷的礼仪，一种方式已为皇上恩准，端礼却敢抵制说：“礼之失自端礼始，端礼死不敢奉诏。”结果被他顶住了。明正德九年的进士祝品，当刑部主事时，武宗皇帝不视朝，每天在西苑游玩，不问国事，朝政为亲信权贵所左右，满朝文武官员都不敢说话。祝品与同官位的应大猷、田登、范时教等冒死上书切谏。谏言戳到皇帝痛处，皇帝大怒，把他们抓起来投入监牢。祝品等耿直的声望彪炳史册，号称七义士。襟怀坦荡，为真理奋斗终生的共产党人华岗，在“血”与“火”的斗争中寻求革命真理，写出了彪炳党史的《中国大革命史》，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不畏权势，敢与王明公开辩论，以致遭受残酷打击。正当年富力强的能为国家做更多工作的时候，不幸蒙受冤狱。虽然身陷囹圄，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上的追求，在狱中写出《规律论》、《美术论要》等近百万言的论著。

综上所述，他们“重道义，轻王侯”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的精神，就是龙游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质，这也是龙游姑蔑文化的精髓所在。

姑蔑文化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，笔者孤陋寡闻，以上述说未免牵强附会，挂一漏万。所以不揣冒昧提出命题，旨在抛砖引玉，引发探讨，以利弘扬。